

中国现代史 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集（下）

一九七九年五月

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

张 太 雷

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广东这一年来的奋斗中间当然亦经过了几次危险时期，如沙基惨案后有英国兵进广州之危险，廖案后有梁鸿楷等倾复政府之阴谋，及陈炯明、魏邦平、熊克武等之四面环攻，这几次的危险程度不过到底还不及现在广东的危险程度。这话怎讲呢？因为那几次虽然危险，而指导的革命党是一致团结的，民众是一致团结的；所以虽然外面敌人压迫甚大而内部的团结力量是足以摧破之。但是现在广东的情形则不然。广东的群众以前是联合的现在破裂了，以前虽分裂而不冲突。现在起了重大的冲突。广州学生成立了两个学生会，两派学生动不动就是用武挥拳。广东工人已有趋于联合之势，而又骤然分裂，工人间的纠纷如粤汉路工人与兵工厂工人之冲突，广州人力车夫之互相殴打。五一节有两个集会：一在东较场，一在西瓜园；五四纪念日又有两个集会：一在东较场，一在广东大学操场；五七国耻纪念日仍是两个会：一在东较场，一在广大操场。最后一次的运动分裂更发生互相冲突致有打伤人之事。群众中此种现象实为广东以前所未曾有之事。至于国民党则自改组以来从未有今日之不好现象。中央党部之威信不足，一般党员多怀疑而无所适从。

怎样会有这样情形的？这些情形是那个造出来？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了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他们每

天在党内青年中间散布谣言，以〔赤化〕恐吓青年们，使青年们发生疑虑，于是他们达到离间的目的。每天暗中在市面上散布共产谣言，唆使商家罢市以达他们破坏财政纷乱金融的阴谋。

他们一面告诉香港政府说：“现在广东是左派执政，所以坚持罢工条件，如果右派能执政则罢工可无条件解决。现在右派快要执政了，所以请你等着罢。”因此有香港停止进行解决罢工之事。反动派要把数十万人民坚持将及一年之罢工卖给香港反动当局，罢工被卖即革命基础亦被卖掉。市面上满散拥护西山会议及打倒国民政府之传单即证明反革命分子的踪迹已充斥于广州。他们这种活动使我们内部团结松懈，使最高党部减少威信，使国民政府动摇，使罢工解决无望，并使人心不安、市面恐慌。我们革命党面前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维持这革命基础？如果我们要这基础，我们要防备挑拨及互相团结起来除掉内患奠定基础。人民同情于我，所以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原载《人民周刊》，第一二、
一三期，1926年5月26日出版。）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赵 世 炎

国民党中央最高干部，自本月十五日起，举行第二次会议，至今已将结束了。当此全国反动势力压迫民众，革命问题十分紧张之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此会议，在事前殊引起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与盼望，因为在形式上国民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大党，自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甚为民众所属望。所以在此次会议中，民众至少所盼望的是国民党最高干部对于目前政局，是如何的意见，有如何的分析，具如何的策略，提出如何的口号，使民众如何的奋斗。这并没有一点苛责或奢望，只是一种常识，民众对于一个政党，当然只有如此认识：譬如每当政变之时，连辛亥俱乐部、新社会民主党、上海总商会还有些意见发表，何况国民党？所以在开会以前，广州的平民群众也如此属望的。

但是等到开会那天，广州城内忽然满城风雨的：“共产”谣言，甚至于有阴谋反革命分子去运动罢市，广州中央银行也挤兑起来，当时各种各式奇怪的谣言发生，或者说五月十五日民党中央将宣布共产，或者说会将没收商人财产；运动罢市的人便说非胡汉民当权不能保财产田宅，煽惑挤兑中央银行的人便说非杀尽共产党，蒋介石始终受包围，银行一切存款，都要没收。这种谣言，街头巷口时常可以听见。三月二十日之役后，反动派的阴谋未告成功，香港帝国主义者也高兴了很少的时间。民党右派分子仍旧有些郁郁不快；

五月十五日之前便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是民党本无左右派，完全是共产党挑拨，这次会议左派既占多数，共派想必又要利用他们打击右派，实行赤化国民党。这种谣言和议论风传后，广州忽然宣布戒严，空气紧张到万分，银行挤兑，军警梭巡，于是社会上对于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感想，便弄得恍惚模糊，莫明其妙：也不知道这次会议究竟是共产党讨论实行共产呢？还是反革命预备杀共产党？

等到该会宣布开会，政治报告之后，关于现时革命策略，北伐问题等，固然没有讨论，关于实行共产，更是一字也没有提起，大家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但是殷殷属望的民众，等待正确明显详尽的革命方针的决议案，对于颜内阁的态度，关于护宪问题的表示……等，待到该会开完，还是没有！一般广州民众，明白的革命的一般人民，都明知道中国现时没有什么实行共产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同样的明瞭：现时的紧迫问题，是怎样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和吴、张之反革命；他们并且要求知道广州的**革命**力量究竟怎样；革命势力内部的纠纷，是否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而毁灭广州的革命根据地。民党中央会议对于这些问题至今还无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亦许只有对于最后一问题的，即广州革命力量的情形。

是的！民党中央这次会议，表示了些该党内部的各派实力的关系。民党之中向来有许多派别，民元以来国会中许多小政团，自称为民党者甚多，确系国民党分化出来，堕落下去的也不少，就广东护法以来的历次政府之中，也有好几派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之后，许多十分腐败堕落的分子固然大半刷除了。但是余下来的这种成分也还有些；同时第一次大会之前，已有共产主义者加入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第

一次大会之后，共产派当然因民党政纲之明确规定而更加增多，第一次大会后政纲既确定，又受民众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的冲动，新生的和旧有的左派日益团结巩固起来。民党中之有派别，在中国各阶级联合革命的过程里，当然是无足怪的很自然的现象。第一次大会明白确定赞助工农，并且更加明确的恢复了民元以来为妥协派（黄、宋）所抹杀，为一般党员所遗忘的平均地权主张，再加之以新定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代表买办土豪阶级之冯自由派，便首先发难，反对国民党的“赤化”，以一切“罪名”，如反帝国主义等，加之于共产派，要求开除。嗣后谢持等又从而附和之。第一届中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便讨论这一反共的纠纷问题。当时正是商团（买办阶级）反革命暴动之时，买办阶级失败，英帝国主义的气焰受一次挫折冯自由也就被开除，而谢持等反共运动，便亦暂告停顿。民党内这种反动派从北京政变之后，历次受大大打击而消沉，尤其是廖案之后。五卅以前，中国无产阶级势力大增，国民党左派得其政治上的赞助，而得形成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便因恐惧而退缩，国民党中也有所谓戴季陶主义发现。随后帝国主义由守而攻，联合主张实行反革命战争，自然而然，民党中买办土豪阶级的反动派及机会主义的右派应命而联合于假借戴季陶主义名义下，召集山西会议，开除汪精卫及共产派。随后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现充分的左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共产派虽减少，而左派势力大增。西山会议派亦召集自己的大会于上海。不过，在这时候北京三月十八日屠杀，国民军败，民众革命运动亦受摧残，广州又有三月二十日反动派之阴谋捣乱，诬陷共产派之事；并且汪精卫也因“病”离粤。——因此，机会主义派中便有些不公开的参加上海大会，这是五

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之内部纠纷的情形，亦就是民党革命力量之消长分合的情形。

这次民党中央会议之前既有党内各派斗争这种历史关系，又有开会前反动派的捣乱造谣威胁，于是这次会议不期然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党务整理案”。开会之前，西山会议派之预留回粤地步者，纷纷都到了广州，甚至于曾经出席于西山会议又出席上海大会被选为右派中央委员之邵元冲等亦去活动。……会外空气之紧张和会后运筹帷幄之努力，都使主持民党中央者专注意于“党务”。这次会议便被“党务整理案”所占据。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围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进展。其中颇有愤愤不平的，有说：

“向来反对共派党团作用的人，如今却自己在背后执行党团作用了！向来以捣乱秩序诬陷共派的人，如今更自己指挥造谣捣乱！难道因有共产谣言，我们中央便应当专事抑制共派以自洗刷吗？帝国主义者见着我们这种情形，真正高兴，我们算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整理党务案究竟是什么呢？蒋介石对于三月二十日事件自请处分（中央议决免议），同时，提出其整理党务案。其中重要之点，即限制共派在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派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他党加入民党者须将其原存党籍报告；推举代表邀请共党设联席会议，请共产党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民党主席保存。并议决选举中央主席。这些议决在前两天的原提案还要复杂些，字句还要严重些，提案后经历次修改才改到现在公布的条文。可是此地报纸不得中央委员会许可，早已将草案原文公布，此等底稿，究系何人取出公布，现尚未调查明白。

这一议案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用不着多所解释；这是左、右、反动各派的一个很复杂的斗争。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的实现了；可是，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

此次会议中，亦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可以一述。右派在国民党内仍然存在，是一件事实，本不是可以否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左派之胜利，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勇于团结的好现象，此时右派无地自容，所以又有右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全中国的国民，都知道这个右派，右派的行动和消息，京、沪各地的报纸都大书右派，加以分别，这并不是别人可以捏造的。但这次会议中，偏有一位孙科要提出一个议决案，要禁止以后国民党有左右之分，结果遭了否决。孙科在会议中且用口头说明，提出本报独秀的论文，指为有意挑拨；而实际独秀那一篇“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分析，是根据于事实，是十分正确的。所以左派与共产派俱在会议中反驳孙科提议之无理。共产派除从理论上解释左右派的原因外，并从历史上与事实上加以说明；左派则痛责俱乐部的组织与另立一党的右派行为之荒谬。此案之结果虽被否决，但在事实上又一次证明反动派之行为的表现。

至于左派，当然受四围种种束缚，如共产谣言，军事暴动的谣言等，可是左派与共产派的联盟很巩固，一般民众，如最近农工学商联合会议，都赞助左派政策。可见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最近（二十六日）民党中央已有对时局宣言发表，大半只是偏重于该党内部解释纠纷意义的说明，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议决案，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排除障

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所以虽然整理党务案本文之中，很明显的有机会主义之渗入，而国民党革命力量之前途，还要看以后“与反动派等战斗”一语之实行如何而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与不革命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之胜负，至少在南方很和民党中央里左派及机会主义派势力之消长有密切的关系。机会主义派是否能对于打击反动派之事不多所牵制呢？

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彻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议决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tion），在开会时对于国民党内部组织问题，如委员人数分配及担任部务之义务等，毫没有什么争执；并且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亦有宣言发表，说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及与国民党合作之意义。至于国民党内部问题，共产党不加可否，正如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党务不应干涉相同。

总之，这次会议的结果，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当然他们留给会后最重要的问题，并非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变更的问题，乃是民党中央是否决然打击反动派，巩固革命战线，以实行不幸现在竟不能实行的国民党的天职——做中国民众的先锋，反抗英、日、吴、张征服中国的战争和统治，集中全国一切革命力量以达到召集国民会议，打倒贿选国会系统的北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民族的经济政治于帝国主义之下。

（原载《向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讯，

第一五七期。）

编者按：赵世炎同志此文是用笔名“乐生”发表的

北伐战争中的独立团

周士第

(上略)

创造铁军

大家都知道，在北伐时代，革命军中有一支战斗力最强、建功最大的队伍——独立团。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就是叶挺同志。

民国十四年冬，叶挺同志被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独立团成立于肇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团中都是新兵，连以上干部多是共产党员。叶挺同志用他全部精力去练兵。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练出了一支健儿。

人们只知道第一次北伐开始于民国十五年七月，但是，在五月间，叶挺同志这支队伍就已出发了。当时，反正过来的唐生智军，在湖南被北洋军伐进攻得很危急，独立团被派为北伐先遣队，出发后沿途接到唐生智告急的电报。叶挺同志亲率着独立团，冒着炎热的天气强行军，当时全团只有一匹白马，给害病人员骑着，他同战士一样的走路。

六月一日黄昏时，到达了安仁县城。抵达后，驻军唐生智部的张团长对叶挺同志说：敌人四个团今天已占领碌田镇，有进攻安仁企图。叶挺同志就要率部立即开到前线，但张团长说他的第二营（营长王东原）在前面警戒，敌人今夜

决不会进攻，坚留叶挺同志和连以上干部会宴，叶挺同志为慎重起见，派第三营去协同王东原营警戒。深夜，饭还没有吃完，接到第三营长的报告：“王东原营已垮了，职营已与敌接触。”叶挺同志沉思考虑了一下，就决定马上出发。他在地图上与大家研究了情况后，对我说：“你率第一营及特别大队为左翼队，我率第二营及第三营为右翼队，明天拂晓攻击，中午十二时以前，你要打到这个村子与我会合。”他用手在地图上指着碌田北面这个村子。

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武力，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了广东革命军，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他这个动员口号，给大家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开始攻击了，经过很激烈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打垮。十一时左右，我和他就在指定的村子里见面了。正在搬运敌人枪械、处理俘虏的时候，我们忽然接到一营一个排长万献廷的报告，说他率领全排已向北追击到攸县城南岸，敌人在城内很混乱，浮桥已被我控制。万排长没有命令而自动追击。叶挺同志极称赞万的机动性，立即率部队出发。占领攸县后，他带着干部去看地形道路，布置阵地，回团部后，他踱来踱去思考，就下令将浮桥撤掉，并通报全体：如敌来犯时，只能向前打，不能向后退。

敌人原来是想乘广东北伐军未出发前，派谢文炳等率四个团攻击唐生智侧背，并切断唐与广东之联络线以瓦解唐军的。但未料到叶挺的部队这样快就赶到了。这一次胜利战斗，解救了唐生智军之危，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基础。事后，唐生智打电报给叶挺同志，其中有“足令敌人胆寒……不仅巩固湘东，而且稳定了战局，此皆兄之功也……”

之语。唐并要下令枪毙退却的王东原，以表示他的军纪严明。叶挺同志电唐力保，王始免于死。

百战百胜的独立团

七月间广东北伐军正式出发，独立团拨归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接着就向泗汾战斗，独立团担任正面攻击，叶挺同志派第一营由豆田过河攻击敌之侧背。前进中，适与向我迂回之敌二千余遭遇，破之，拊敌背，敌溃，独立团追击，首先进占丰陵城。

八月，十二师进攻平江城。敌守将陆云，是吴佩孚军中素称善战的将领，他的队伍，都是吴部的精锐。并在平江城南端之鲁肃山一带，构筑强固工事，遍埋地雷。陆云曾自夸平江城为金汤。

我军进攻方法，是以三十五团在正面佯攻，三十六团迂回，独立团则从右翼去包围。因为有农民引路，当独立团及三十六团从山径绕到平江城下时，陆云还在司令部打麻将，独立团乃从敌人后面进攻，经过无数次肉搏，将敌全部歼灭，陆云自杀。

占领了平江城后，独立团又为先锋，继续追击，以强行军占领中伙铺车站，切断了粤汉路岳州方面敌之退路。接着就是向汀泗桥进攻。第四军六个团都向这天险的阵地攻击，攻了一天一夜，没有大进展，后来调独立团从右翼包围攻击，敌人遂全线溃退。

汀泗桥战役后，独立团在叶挺同志率领下单独向咸宁追击，到达咸宁南岸时为水所阻，仅有一条铁路桥可以通过，形势之险较汀泗桥实有过之。叶挺同志看到这里敌人虽多，但极混乱，遂在征求各营长意见后，决定派第二营从桥上冲

过去，以两挺重机枪掩护，这几百个健儿，勇往直前，虽然死者伤者纷纷落下河中，但仍前仆后继的和敌人肉搏，结果终把守桥敌人打垮。这时，叶挺同志即亲率部冲过去，又将守城之敌击溃，占领了全城。

当叶挺同志进入敌人的司令部时，司令部的电话还在响，他拿起来听时，原来是贺胜桥打来的电话，说是吴佩孚已到了贺胜桥，向这里询问汀泗桥方面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我军已经占领了咸宁城，足见在叶挺同志率领下的队伍进军之速。

由此也可看出：倘若叶挺同志在当时不机断专行，进行进攻（张发奎曾来命令要独立团不得追击超过汀泗桥十五里）和进攻咸宁，待吴佩孚带援兵到咸宁后，利用天险固守，则战争形势又不知如何变化了。这是为当时第四军军长陈可钰所承认的。三天后第四军又向贺胜桥进攻，独立团担任铁路及其右侧的攻击。当独立团突破敌人阵地进入纵深已颇远时，后面的部队还没赶上来。由于向前攻击过猛，有些残余敌人掉在后面没有肃清，叶挺同志遂遭到四面敌人的射击。此时又接到第二营报告称：营长已受重伤，现在敌四面包围中苦战。第五连攻到吴佩孚指挥阵地附近，伤亡过半，请增援。此时，叶挺同志手中只有一个连了，情势十分危急。但叶挺同志在此时仍然镇定如常，经一番沉着的思考后，他对我说：“你到前面去指挥第二营与第一营，坚决向吴佩孚指挥阵地攻击。现在我们只有向前找出路，左边右边后面都没有路。在我英勇的战士猛攻后，终把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占领了。于是，叶挺同志乃指挥着部队乘胜向贺胜桥攻击，在他英明的指挥下，数万敌人垮下，真是像山崩一样。吴佩孚退到贺胜桥镇上后，还斩了一个旅长的头挂在街上，

但是也不能挽救他的失败。我们进入街上时，那个旅长头颅的血还在滴下。

九月五日，以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为先锋，革命军打到武昌城下。

开始攻城时，第四军各师及第一军第二师等，都挑选奋勇队爬城。独立团也指定了第一营为奋勇队，担任大东门及通湘门的爬城任务。在爬城战中，其他师的奋勇队很多没有进到城墙，就停止了，只有独立团第一营进到了城墙，并且树起了四个梯子。但是，因为敌人十分顽强，爬上城去的战士大都英勇牺牲，数次猛冲，都未攻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六日四五点钟的光景，陈可钰突由洪山军部打电话给叶挺，说据第二师（师长刘峙）报告，他们部队在鸡叫前已进城了，叫叶挺同志赶快率全团进城。闻悉，叶挺立即率第二、第三两营及特别大队向大东门前进，但是，当走到城附近时，即隐约看见守在城上的还是敌军，不是第二师的队伍。正在怀疑中，这时又接到第一营长曹渊的报告，其中说：“职全营现已牺牲殆尽，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报告上有曹渊署名，但渊字的最后一笔划得长长的。原来当他写完了这报告时，头上也中了一个子弹而牺牲了。这时叶挺同志才知道，第二师进了城是假的。他立即到军部查明事实真相：原来是第二师估计叶挺的独立团一定会攻入城，他们就先捏造说在鸡叫前他们已进城，以夺取先攻进城的功劳。叶挺同志对此事极为气愤，事后他向四军军长提出：“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指刘峙师）没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

爬城失败后，独立团开回南湖，担任围城任务。叶挺同志日夜都计划如何攻城，他想了一个办法：坑道进攻。他找到一列火车，在南湖附近用钢片沙包装起来，开到通湘门附近，掩护工人坑道作业。但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敌人发现，立即集中火力在通湘门掩护一千多人冲出来破坏坑道。但敌人终未得逞，经过一边恶战后，在叶挺同志指挥下，敌人很狼狈的被击退了。十月十日总攻武昌城，独立团终于在通湘门附近首先用云梯爬城，并占领了蛇山。武昌城遂最后被攻陷。独立团进城后，肃清了敌人，就集结于蛇山。驻防后，部队从不进民房，从不“打搜索”，其纪律之严明，为人民所称道。因此，当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以后，两湖人民给了独立团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

这就是铁军之来源。

叶挺的队伍为什么会成为铁军

独立团为什么会获得了铁军的称号？为什么在北伐战争中建立了如此伟大的战功呢？民国十五年冬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叶挺同志曾经在独立团的干部会上总结了北伐战争经验；在会上，他讲了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的伟大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如果我们团内没有这样坚强的共产党组织，没有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则不论那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够胜利，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的队伍，人家会不会叫我们作铁军呢？我想是不会的。

独立团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这支

队伍有着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叶挺同志，但是对于这一点，叶挺同志却是极端谦逊的。他在每一次胜利后都把功劳归之于党、干部和士兵。他时常对大家这样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我深深感觉到，每次战斗中，当我下了命令之后，我就跟着你们大家走了。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排长万献廷同志在指挥我，贺胜桥战斗最后阶段就是第二营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

独立团之所以成为铁军的第三个原因，是在整个北伐中间，它始终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特点。从独立团成立起到改为七十三团，虽然在番号上是隶属于第四军，但是这个团干部的调动和任免，都是决定于共产党，而不是决定于军长师长，虽然在形式上还要经过师长军长的批准。这个独立自主的原则的坚持，必须归功于叶挺同志的坚强不移的战斗精神，这个在党的领导下的独立性，到后来差不多成为合法的了。

我们必须肯定的说，由于有这些独立性，独立团才能始终保持和发挥其战斗力，保持和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而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成为铁军。比如，从碌田战斗起到占领武汉，团中共伤亡排级以上干部达六十余人，士兵达一千二百多人。如果不是由共产党调人来补充，是无法维持战斗力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员做骨干，是不可能高度的斗争意志的。如果不是有人民的拥护，到处有人民来参加军队，和独立自主的成立新兵连、新兵营、特别大队等，则也是无法维持和进行这样激烈的战斗的。因此，有一次张发奎对叶挺同志说：“你们这个独立团真是‘独立’的。”叶挺同志就立刻回答他：“是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独立，我们现在才能坐在武昌城内说话！”

的确，正是有了这些独立性，所以这支队伍才能一天天更加走向人民那方面去，成为以后红军第一军团的基础。

（摘自周士第：《回忆叶挺同志》，《中国共产党烈士传》新华书店版。现题为编者所加。）